

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实践

刘向东 著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实践/刘向东著. —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2001. 5

ISBN 7-80004-910-8

I. 邓… II. 刘… III. 邓小平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研究 IV. A849.1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2934 号

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实践

刘向东 著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定门外大街东后巷 28 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朝阳经纬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625 印张 378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04-910-8

F·523

定价:35.00 元

一、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作出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创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纪元，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开辟了我国走向富强的广阔道路。

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我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以其非凡的政治敏锐和判断力，精辟地总结了我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及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分析和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阐明了争取长时间和平环境进行国内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准确及时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提出了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这个时代的趋势，果断地提出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他语重心长地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①这是邓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关键时刻的伟大历史性决策

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但那个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什么都是‘崇洋迷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

在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国际环境在70年代发生重大变化。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

^① 本书所引邓小平同志的论述，都出自《邓小平选集》第二卷、第三卷。

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这是中国、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在这个问题上主张正义的其他国家长期斗争取得的巨大胜利，是美国企图在国际社会孤立和排斥中国的错误政策的最终失败。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2月28日，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联合公报》强调提出了双方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方重申了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原则立场，美方表示：它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还规定双方将为逐步开展中美贸易以及进一步发展两国在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领域的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尼克松访华和《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为以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打下了基础。1972年9月25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总理和外长以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为中心进行了认真、坦率的会谈，取得了圆满成功。双方于9月29日签署发表了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并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中日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1973年9月11日，法国总统蓬皮杜应邀访华，他是欧洲大国中第一位应邀访华的国家元首，双方就主要国际问题和中法关系友好地、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并发表联合公报，强调这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重要阶段。毛泽东同志精辟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关系的变化和我国外交关系的重大突破，1974年2月，在同一位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谈话时，他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1974年4月，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阐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

的战略思想：“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为当时的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战略依据，也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条件。

在国内，以粉碎“四人帮”为契机，进行了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工作。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逮捕“四人帮”，一举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沉重的灾难。“四人帮”横行10年，在思想上、组织上造成极大的混乱，将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掀起了声讨、批判“四人帮”的高潮，对“四人帮”散布的各种谬论进行了清算。接着，又进行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指出：对“四人帮”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从理论上对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予以彻底否定。大家认识到，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客观实际，是否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提高了全党干部的马列主义觉悟，使人们从过去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对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为确立对外开放政策作了思想准备。“文化大革命”中，17.5%的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副部长及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高达75%；还有的虽未被立案审查，但被戴上“走资派”、“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帽子，受到迫害，亲属被株连。党中央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进行了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什么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

要改正过来。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对于医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创伤,落实干部政策,促进安定团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创造了重要条件,也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作了重要的组织准备。

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界成为“重灾区”,广大知识分子被列为“臭老九”,受到压制、迫害。正确对待和评价知识分子的作用,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有极其重要意义。1978年3月1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澄清了在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重大是非,强调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对我国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提高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打下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倒行逆施,使我国的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心急如火,决心要把“四人帮”耽搁的时间夺回来。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出国访问时,不说日本、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就是看了当时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伊朗等发展中国家,也深感我国的经济技术水平比他们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比他们低。他们同时也了解到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起来也不过用了十几年时间,对我国改变落后面貌,实现四个现代化也增强了信心。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仅靠这些经验,尚不能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还必须借助和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

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为了统一认识，集思广益，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1979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务虚会，请各部门各方面主要负责同志共同商讨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大计。会议上群情激昂，大家纷纷献计献策，表达了全国人民加快现代化建设的迫切愿望。会议强调要利用外国资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还讨论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指出要充分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实行专业化，适当扩大企业自主权。会议在发展国民经济问题上虽求成过急，但为扩大对外开放和全面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作了思想准备。比如，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但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为了大大加快我国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这比关起门来样样靠自己从头摸索，要快不知多少倍。这就进一步澄清了“四人帮”对自力更生方针的歪曲，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会议还提出：为了抢时间，应该引进一些关键设备和成套设备，并且还要同时引进必要的工艺技术和设备制造技术；要把新技术的引进同企业的改造、改组结合起来；对引进的技术要努力去消化、发展、创新；要有进有出，采取多种形式把出口贸易做大做活，并增加各种非贸易外汇收入，保证外汇支付能力；实行“以进养出”，发展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搞补偿贸易；利用银行信贷进口设备，只要产品在国际上有销路，贷款归还还有保证，可以积极搞；等等，这些都大大地开阔了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1979年当年即签订引进技术和设备合同总额达78亿美元，其中成套设备项目22项，用汇64亿美元；还开始签订一批小型补偿贸易项目；与美、英、法、日的公司签订合作勘探海上石油风险合同；与外国的一些公司进行合资经营项目的探讨；技术引进的方式也有一些新的发展，如采用合作生产，技术咨询、

合作设计等；派人出国到对口工厂学习技术和管理等。当然，回过头来总结经验教训，当时由于缺乏经验，一下签 22 项成套引进项目是比较急了一些，综合平衡衔接不好，项目所需的原材料，燃料动力不落实，准备工作差，有的设备到货后，厂址还没有定下来；大部分是现汇引进，造成外汇紧张，国内配套资金也超过能力。但是经过这次实践也使我们逐步成熟起来。

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一直是邓小平同志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1978 年 9 月 18 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鞍山市委负责同志汇报时指出：“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又指出：“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还指出：“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企业要有主动权、机动权，……企业应该有点外汇，自己可以订货，可以同国外交流技术。”同年 10 月 10 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并说明，实行开放政策，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1978 年 12 月 13 日，邓小平同志在为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在中国发展历史上有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其中强调：“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有这么多个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

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他强调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指出：“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进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

在进行了一系列思想上、组织上拨乱反正工作的基础上，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了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指出：“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开辟了对外开放的新纪元。

（二）迈出对外开放实践的第一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开放的决策，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人们顾不上欢度传统的春节，就开始筹划具体行动了。

为稳妥地推动改革开放，要先试点，后推开。从哪里开始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参加会议的广东省、福建省的主要领导同志提出，两省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只要是给予必要的对外经济贸易的自主权，就可以很快赶上当时东欧一些国家的发展水平。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和研究了他们的意见，认为从广东、福建两省开始改革开放的试点是可行的。这两省具有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一是靠近香港、澳门，地理位置好。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与港澳毗邻，

国际交往十分方便。福建海岸线长,与港澳也只是一夜的航程。这些都有利于同国外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特别是有利于利用香港的市场、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香港地区的航运和国际贸易比较发达,已逐步成为国际贸易和航运中心;与内地特别是广东地区的经济联系比较密切,且有互补性和运输便利等条件;其资金雄厚,技术也有较好基础,许多华人愿为祖国经济发展贡献力量;香港面积小,人口密度大,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内地毗邻地区可为其提供发展的空间。二是华侨多,利用侨汇、侨资条件好。两省都是著名侨乡,广东旅居海外的华侨和外籍华人有800多万,福建有500多万。其中有些人是高级知识分子,科技专家,有些是拥有一定资本的工商界人士。三是资源丰富,自然条件好。两省地处亚热带,粮食和经济作物种类多,单产较高,地下矿藏也比较丰富,轻工业、手工业基础比较好,日用百货、工艺品生产都有一些名气,电子工业也在起步,还有一些较著名的风景区和名胜古迹。

建国近30年,我们是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几乎完全封闭的状况下,按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模式进行经济建设的。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恢复和坚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政策,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认真的改革,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高速度地、稳定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知识和经验显然是不够的。尽管粉碎“四人帮”后,各级干部都到外国进行了一些考察,但所了解的是相当有限的,也是比较零碎的。为使试点方案制订好,达到预期目的,1979年春节,当时主持这项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邀请在日本经济起飞时期担任过企划厅长官的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及其助手日本兴业银行调查部部长小林实先生访华,介绍日本经济起飞时的经验,并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行咨询。日本专家首先向我提供了根据他们掌握的资料测算的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金投入及解决办

法,并指出,中国是在和平环境下进行建设,应力求综合平衡发展;为了积累资金,扩大出口,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发展轻工业是必要的,重工业的发展可推迟一下。当年秋天,他们又再次来华,重点介绍了这样几方面的内容:

(1)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选型问题。

日本专家介绍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结构类型。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可以分为国内自给自足型、国际分工型和中间型。一般地说,国家越大,自给程度也就越高;生产越发展,工业水平越高,依靠外贸的程度也就越高。从计划和市场的角度,可以分为市场经济型、计划经济型和混合经济型。从集权和分权的角度,可以分为中央集权型和分权型。分权型又包括地方分权和企业自治两种。从积累和消费的角度,可以分为重视消费型和重视积累型。总之,合理的经济结构应当符合五个要求,这就是:有利于增加收入,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合理分配和充分就业。其中根本的是增加生产。

中国经济的发展应当采取哪种类型呢?日本朋友认为:第一,中国应建立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与有计划的国际分工相结合的经济类型。第二,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发挥市场经济的优点。今后可以对企业只从资金上控制,这样企业就可以更灵活地安排和计划自己的生产和流通。如果这种改变过于突然,也可以考虑从价格上过渡,即在价格上搞得活一点,用价格来调节供求。第三,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应当采取地方分权型。但有些产业如全国性的运输、通讯和一部分基础产业应由中央集中管理。第四,从整个经济发展来看,中国应当采取积累型,以积累为前提,同时又不要过分。重视积累并不是轻视消费,从长远看,积累型国家(一般积累率大于25%即可看作积累型)的消费要超过消费型国家,实际上是一种忍受暂时的低消费来换取将来的高消费的一种政策。至于消费结构,各国情况不同,从中国来说,在今后一个时期,小汽车生产可以不考虑;彩色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等耐用

消费品应该有计划地加以发展。消费资料生产要适应需要多样化和变化无常的市场,对易耗品和耐用品的生产要统一考虑,合理安排,还要通过创名牌来扩大消费品的出口。

(2) 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问题。

专家介绍,日本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是通过大量投资实现的。所需资金绝大部分依靠国内积累,外国投资只占总投资额的1%,占设备投资总额的2%~3%。这主要因为:当时国际金融市场不够发达;日本信誉低下;日本企业怕被外资吃掉;国内积累率较高。他们认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要筹集足够的资金,一靠提高国内的劳动生产率,增加积累,二靠提高资金利用率,三靠有效地利用外资。中国现在的情况同日本经济高速度发展时期的国内外条件都不同。现在国际上游资多;中国的信誉高;设备成本大大提高,进口设备光靠国内资金是不够的;世界性的通货膨胀还在继续着,可相应地减轻还债负担,所以可以更多地利用外资。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外资,应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①控制债务偿还率(即当年的还本付息额与当年的外汇收入之比)。这一比率的界限一般为20%。如果超过这一比率,就可能出现靠继续借债偿付贷款本息的现象。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会受到国际金融组织和债权国的干涉,重新讨论借款条件,实行有损国家主权的种种监督。②借款一定要同国内自备资金结合起来使用。自备资金一般不应小于引进项目总投资的30%。全部用国外贷款建设的项目,在国际上还没有先例。如果不能解决引进项目所需的自备资金,应该调整计划。③应该把外贸放到相当重要的位置,设法增加外汇收入。从长远发展看,中国按人口平均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所以要发展创汇率高的加工工业。另外,中国发展旅游很有前途,搞得好的话,每年收入几十亿美元是不困难的。④中国的外汇管理权也应由国家集中控制,如分散给地方和企业直接搞引进,搞得很乱,有的偿还不起,将影响国际信誉。⑤政府贷款与民间贷款掌握在1:1的比例较好。前者利率低,期限长,但手续较复杂,后者则相反。⑥关于汇价的确定,现在一般采用

四种办法：即浮动汇价制；与世界某种主要货币汇价连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单位连动；以及根据本国同外国贸易量的构成情况加权平均计算本国货币同各国货币的汇价。人民币汇价采用最后一种做法较好。⑦搞合资企业，如果主要考虑扩大出口，不如搞自由贸易区。

(3)资金的有效利用问题。

两位专家在介绍了日本企业资金的来源和管理情况后，提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取决于把国民收入中的大部分用于投资和怎样有效地利用这些资金。中国企业得到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都是由国家财政拨给的，企业不感到还本付息的压力，很少考虑有效利用资金的问题，养成了大手大脚使用资金的习惯。通过银行贷款方式来分配投资和流动资金是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在使用国家资金时，必须付给利息并负有按计划偿还的义务，这样，对于借款人赋予一种责任，是有效利用资金的第一步。中央银行控制资金总的款额动向，一部分小额资金的分配权交给地方掌管。资金要有重点地分配到最需要的部门，对于需要大量投资、建设周期长的产业，要预测长远需要，及早安排，并做好建设过程中的资金分配。当然，对于还没有广泛发挥银行机能经验的中国，进行这种改革会碰到许多新的问题，但在解决问题中会培养出大批人才，有利于促进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另外，中国的库存率太高。日本一般企业的库存和固定资产价值之比为1：2.5，而中国企业几乎是1：1，这对资金的有效利用非常不利。

这些介绍和建议，当时听了是比较新鲜的，对我们思考问题是有帮助的。此后，又邀请二位专家访华，更详细地介绍了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在大来佐武郎的推荐下，又邀请在日本经济起飞时担任国土厅长官的下河边淳先生来华访问，介绍有关方面的经验。有些介绍是很有针对性的。比如，在介绍日本解决住宿困难时，大来先生说：日本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住宅紧缺的矛盾十分突出，主要考虑解决没地方住的问题。于是，就盖了许多高层的

阁楼楼，房间的配套设施都因陋就简。到了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收入增加，要求住的要舒适一些，但是再盖新的住宅又受土地的限制，已有的住宅又没有改善条件的余地，只好把盖起来还不到十年的高楼炸倒重建，造成很大的浪费。希望中国在解决住宅规划时考虑这个问题。下河边淳曾经写过日本的《列岛改造论》一书，据说，该书成为田中时期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应该说他在国土规划和改造方面很有经验和见解。当时就有人提到，能否也帮助中国制订一个国土改造规划。下河边淳先生谦虚而又诚恳地说，中国的国土非常辽阔，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都差异较大，这是日本所不能比的，凭自己的学识和经验，很难做出个符合实际的国土规划。从实际和可能考虑，指定某个省，还可以试一试。这种实事求是的话语，是使人非常感动的。为使这种经验交流经常化，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每年轮换在中国和日本开一次会，就相互关心的一些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

根据中央指示，1979 年春节后即作准备，谷牧同志于 4 月即带领一个由当时的进出口办、计委、建委、外贸、财政、物资等部委及银行领导同志参加的工作组去广东、福建两省，帮助省里研究落实中央关于对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决策。经过近一个月的时间同省里充分讨论和研究，确定以下改革和政策措施：

(1) 财政、外汇实行大包干。即外汇以 1978 年实绩为基数，财政以 1979 年实绩为基数，从 1980 年开始，一定五年，除外贸出口外汇增长部分上缴中央三成以外，财政和其他各项外汇收入的增长部分，全部留给省里，由省内综合平衡，包干安排。福建经济基础较差，实际是实行定额补贴办法。

(2) 计划、外贸、企业管理等权限下放。除铁道、港口、邮电、民航、海关、银行和国防科研、国防工业等企事业单位外，其他一般都交由省管理，计划以省为主制订，报中央有关部委备案，纳入全国计划。省里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自行安排劳动力，奖金提成比

例，可略高于全国水平。省可设立投资公司，吸收侨商、外商投资，自借、自用、自还。凡不涉及国家综合平衡的加工装配、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项目，由省自行审批。省里生产出口的商品，可在本省口岸直接成交出口。地方外汇进口物资作价和地产地销商品作价，由省决定。可在港澳设立外贸业务机构，承办本省业务。

(3)物资、商业体制适当运用市场经济的作用。以1978年为基数，保证调出调入，从1980年起，一定5年不变。以后少调或超调部分，由省和国家有关部门商定，用人民币或外汇进行结算。

(4)试办出口特区。与两省商定，先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设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事业。特区管理原则，既要维护我国的主权，执行我国法律、法令，遵守我国的外汇管理和海关制度，又要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比如，外商投资办厂受国家法律的保障；对所需的进口物资和出口商品，实行优惠税制；外商所得合法利润，可按规定汇出；简化人员出入境手续；银行可同中国银行的港澳分行直接往来；工资可以适当高些，等等。开办特区关键是要做好立法、干部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准备，要经过试点，有步骤地进行。

要做好这一新的尝试，要求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做好思想准备。对可能带来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影响，要有精神准备，把工作做在前头。要加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面教育，提高建设家乡的责任感，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树立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要敢于独立负责，加强全局观念，搞好同左邻右舍的协作配合；中央各部委要放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加强具体指导，不能撒手不管。

(2)组织上做好准备。从两省的情况看，组织机构和干部的知识水平都很不适应对外开放、扩大自主权的需要。两省要用相当的精力来抓这方面的工作，建立和充实业务机构，采取多种有效形

式,尽快培养一批精通外语和对外经济贸易业务的干部。

(3)抓紧必要的配套建设。要加快农业发展,保证必要的农副产品供应;加快能源建设,解决必要的能源、电力供应;加快铁路、港口、码头和公路建设,缓解交通运输紧张的矛盾。

(4)要加强调查研究。重视掌握各方面的信息,发现新情况,研究解决新问题,不断总结新经验,推动改革开放健康发展。

邓小平同志始终亲自关心和指导这一重大实践。1979年6月18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报告指出,无论在三年经济调整期间或今后的长时期内,我国都将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并且采取国际上通用的各种合理的形式吸收国外资金。这是我国政府坚定不移的重要政策。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1979年7月30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决定:为了加强对外国投资的管理,设立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为了加强对进出口、外汇平衡和引进技术工作的管理,设立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为提高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推动实践,邓小平同志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性。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强调:“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还指出:“过去我们统得太死了,很不利于发展经济。有些肯定是我们的制度卡得太死,特别是外贸。好多制度不利于发展对外贸易,对增加外汇收入不利。”1979年11月26日,他在对外宾谈话时进一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

加快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导思想,国务院于1980年4月和1981年5月,分别在广州和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特区工作会议,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教训,完善有关政策措施。进一步明确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统一认识。

一是要深刻认识和理解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重要意义。会议认为,中央决定对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发挥两省优势,使两省先富起来,同时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新的经验,是完全正确的。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主要内容归纳起来大体是:①对外更加开放,包括积极利用侨资、外资,引进适用、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扩大对外贸易;②政策更加放宽,包括在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和各种经济杠杆,把经济搞得更活;③扩大地方的权力,包括经济、人事、地方立法权和企业自主权等。总之,要改变那种权力过分集中、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吃大锅饭的体制,做到讲求经济效益,按经济规律办事。两省的改革和全国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两省改革搞好了,不仅在发展经济上有重要意义,而且是在政治上关系到稳定港澳人心,争取台湾,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事。

二是要正确认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试办经济特区的问题。1980年4月会议将出口加工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试办经济特区,是对两省实行特殊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执行开放政策、吸收外资的一种特殊方式。有些同志有疑问:特区会不会变成租界,是不是殖民地?会议认为,这些疑问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的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内全面行使我国国家主权,和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特区是扩大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发展经济的比较成功的好形式。对我国来说,特区是我们学习与外国资本竞争、学习按经济规律办事、学习现代经济管理的学校,是为